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梁方仲遗稿

梁方仲 著 / 梁承邨 李龙潜 黄启臣 刘志伟 整理

读书笔记(上)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梁方仲遗稿

梁方仲 著 / 梁承邨 李龙潜 黄启臣 刘志伟 整理

读书笔记（上）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方仲遗稿 / 梁方仲著; 梁承邨等整理.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218-13211-2

I. ①梁… II. ①梁… ②梁… III. ①中国经济史 - 研究 - 文集 IV. ①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5808 号

LIANG FANGZHONG YIGAO

梁方仲遗稿

梁方仲 著

梁承邨 李龙潜 黄启臣 刘志伟 整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出版统筹: 柏 峰 周惊涛

责任编辑: 陈其伟 周惊涛 柏 峰

装帧设计: 彭 力

责任技编: 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600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60.00 元 (全八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3157 83795240 邮购: (020) 83795240

序一：体悟中西文化之源流，开拓史学新天地

叶显恩

梁方仲先生的著述文稿，中山大学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已经安排专人负责搜集、整理。尔后，又有他的一些学生以及后学参与这一工作。自 1989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一书始，至今已先后出版五部^①，其中以 2008 年为“梁方仲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准备而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梁方仲文集》（八卷本）较为完整，但仍有一部分旧作和遗稿尚未收入其中。在梁先生遗物中又发现一批富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历史专题数据统计和年表、听课笔记、读书笔记、书信翰墨、案头日历记事等。

作为一代杰出学者，方仲师未收入文集的旧作、未刊稿，以及专题数据统计、年表等研究成果固然应当继续整理出版，以传诸后人。至于他的家学渊源，走过的学术道路，他的治学方法，他的学术关系网及其在其中作用，乃至日常起居，等等，都是后学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些未曾问世的遗稿中，有 20 世纪前半叶用中、英文作的听课笔记，内有中国学界之泰斗陈寅恪、胡适，英国费边社名学者托尼^②；

① 《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年；《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年；《梁方仲文集》（八卷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② 托尼（1880—1962），经济学家，费边社会主义者。曾任牛津大学研究员。他的《16 世纪的土地问题》《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乡绅的兴起》等都是社会经济史的著名论著。托尼研究的不是纯粹的经济史，而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叉史。这正是方仲师与之见解近似之处。方仲师自认受托尼的“启发不少”。

以及革命领袖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讲演笔记；还有分量不菲的读书笔记。其间保留了一些难得寻觅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所学、所思、所得。从他与友人间的彼此诗词唱和、信札、墨宝和案头日历记事等，既可窥见朋友间的交谊和学术交流，又可了解一个学者日常生活的真实情态。

方仲师留下的上述遗泽，具有历时性和独一性的品格，是难得的宝贵学术资源。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方仲师真实的为人和为学。因此，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嘉惠后学之盛事，可喜可贺！

方仲师为创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筚路蓝缕，奉献终生，无恨无悔。他著作宏富，尤以《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三部巨著，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树起三座丰碑。他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重要奠基人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作为方仲师的入门弟子，关于他一生的理想、走过的道路、取得的业绩等，我先后已经有五文谈及^①，喜读《梁方仲遗稿》之后，仍感言犹未尽，拟再谈点感言，以就正于学术界同仁。

眼界与格局

我从梁师身上感受到作为一个学人，眼界和格局对学术的影响关系至大。当年方仲师教诲我说：要小题大做。他意是指入手处不妨小，所见及者不能不大。从小问题折射出大千世界，即所谓“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吴于廑老师词句）。其间存在一个个案

^① 《序言：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重要奠基者》，载梁承邨：《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又载陈春声、刘志伟主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为创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筚路蓝缕，奉献终生——2008年11月（广州）“梁方仲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词》，载陈春声、刘志伟主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对学术执着追求、一丝不苟的儒雅学者梁方仲》，载张世林主编：《学林往事》下册，北京：朝阳出版社，2000年，第1295—1312页；《著名经济史家梁方仲传》，韩文甫主编：（香港）《文学与传记》第一期（1999年4月15日），第82—89页；《梁方仲传略》，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257—269页。

与总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作小专题要放眼历史总体。眼界要高，格局要大，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自说自话。方仲师曾以易知由单、两税税目、户帖等小题目为文，其投射面虽有限，但将它置于田赋制度的总体中考察，同时放眼于明代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宽阔的历史视域，便发现这些小题目研究的不是一个孤立的史事，而是历史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以田赋制度作为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衔接点来研究，正是放眼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尤其着重于以农民为主体的基层社会变迁史。他本计划在他围绕田赋史（包括明代以前的田赋史）已写出的专题文章的基础上，先完成《13—17世纪中国经济史》，继而撰写《中国田赋史》，再进而写《中国经济史讲义》，构建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体系。我觉得只要认真研读方仲师的文章，当可发现他在选题立意、洞察幽微中所体现出的眼光之深邃、学养之深厚。他写出来的只是公之于众的一面，隐在纸背的另一面即所谓隐藏玄机，更具个人的特色和风格。具慧心的读者自可体会他治学的高远眼界和恢宏格局。

方仲师的眼界和格局是同他的人生高度相联系的。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簪缨世家。高祖同新、曾祖父肇煌，父子两人皆进士、翰林，任过顺天府尹和地方高官；祖父庆桂，举人，内阁侍读，学部上行走；父亲广照，留学日本，清末任刑部（后改法部）主事、举叙司员外郎。1911年，年仅三岁的方仲师从出生地北京随同父亲广照回到广州，与祖父庆桂同住在广州市区下九甫一座四进的大宅第——祖居“京兆第”。他幼承庭训，又有塾师系统教育，还不时请邬庆时等硕学名儒作授课补习。家中藏书甚丰，俨然一图书馆，可供课余阅读。自幼便奠下了深厚坚实的国学根底。及长，到天津、北京名校就读。尔后又到欧美和日本留学。他在中外学海中遨游，可以同各种流派的学者、名家接触，请教、切磋，感受西方学术意蕴。方仲师宏富的著作之所以具有原创性、突破性，令人开阔眼界，开阔胸襟；之所以能处于学术的前沿，立于文化的高地，是由他的博古通今和学贯中西的学识所铸就的。

从方仲师的社交层次、信札函件、诗词唱和中，可以看到他交往的人，或为同辈的学术精英，或为前辈学术名流，或为社会贤达，甚至还有清代末科的科举高中者^①。他“择高处立”，因其站得高，所以望得远。但他又“寻平处住”。这就是他的为人格局。他学术上“发上等愿”，眼界力求宽阔而高远，但他又选“享下等福”，平日刻苦用功，生活俭朴。关于刻苦用功的情景，李文治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说：“梁先生工作不分昼夜，在四川李庄时白天工作八小时，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一年四季如此。”^②我20世纪60年代初在他门下攻读研究生时，偶尔深夜路过他窗下时，也发现屋内灯光仍然亮着，也印证了这一说法。至于生活之俭朴，我在前写的回忆小文中，也曾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州市市长朱光宴请他，因着陈旧的棉袄而被门警阻拦等生活简朴的趣事。家中的陈设同样陈旧简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40多岁被评为二级教授，每月317元的工资相当不菲，但经常用以接济亲朋故旧，如有困难的老助手、保姆等，所剩也就不多了。在经济困难、营养匮乏的年代，政府特殊照顾他本人的一点油、肉，也用来和他的学生共享。待人博爱竟至乃尔。

方仲师的为人为学，令我想起左宗棠的一副名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曾祖父梁肇煌晚年同左宗棠是上下级的同僚，深得左宗棠的赏识和倚重，任过代理两江总督、江宁布政使之高官。梁家与左氏是结有缘分的。方仲师的为人显然深受左宗棠提倡的这一为人格言之影响。

重视史学的基础建设工程

方仲师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发起成立史学会时，就以“重视史料的搜集”作为研究会的主要宗旨之一。对于这一主张，他终生服膺。

① 指中山大学商承祚教授之父探花商衍鎤。

② 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9页。

在方仲师看来，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辨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基础不牢，立论如同建在沙滩上，经不起考验。对史料要尽可能地广为搜集，就要懂得版本目录学的知识，以及具备一定的古文水平，以有助于把握史料的含义。所以，我刚投入方仲师门下时，便教过我版本目录学，并着我去聆听刘节先生开讲的《左传》等古文课程。

本遗稿中的读书笔记，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到他搜集史料方法的一斑。他根据自己选定的研究方向来决定对资料的采集，或作摘抄，或是读后心得，或作量化的统计，或作表列。量化统计是其读书笔记的最突出特点之一，统计时有一事一物的统计，也有某专题、某地域长时段的数据统计。诸如，《汉唐酒价》《宋代物价与京师火灾》《唐宋明清米价、物价》《清乾隆朝江苏省物价工资统计》[清乾隆年间与民国十五年物料价值比较表、匠夫工资表、江苏省物料工资价值表（清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年）、江苏省物料工资项目对照表、江苏省物料价值表补遗（清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年）]，等等。《明代督抚表列》，就是表列的形式。方仲师把纷繁零碎的资料，按时、空、人、事串起来，显示出内在联系的脉络，使之灵动起来，以勾勒出历史的本来面貌。由于他坚持尽可能发掘更多可以量化资料的做法，获得世人称道之成果，被誉为历史统计之大师。

方仲师注重社会调查。他认为社会调查的资料，既可扩大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也可用以印证文献的记载。这与受陶孟和先生影响有关。陶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的元老。1933年，方仲师加盟陶先生主政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备受陶氏倚重。1935年，他就同朱炳南、严仁赓到浙江兰溪县、安徽当涂县进行土地陈报的调查；1936年，又与严仁赓往江苏、河南、陕西做地方财政的调查；1939年7月，受陶孟和之命，往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查农村经济。此行除重点访问延安之外，还在绥德、米脂、榆林、内蒙古、天水、宜川、秋林、城固、西安、汉中等地做了实地调查，先后历时八个月，搜集了大量的有研究价值的资料。

做社会调查还可有助于提升对现实的活生生事物的理解能力。这

往往是专业作者所缺乏的。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便把对现实的理解能力视为“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因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两者有内在的联系。在对现实感悟、理解能力的观照下，更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看得透彻。方仲师是率先将经济和社会相结合研究且取得卓越成就的学者之一，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创建立下了开创之功。诚如居蜜博士（美国联邦政府成就服务贡献奖获得者）提交2008年在广州举行的“梁方仲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所说，她最近调出她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向杨联陞、余英时、费正清诸位大师学习的档案仔细阅读，“恍然悟出，当今一辈学人，社会经济史的基础是在梁先生的一笔一字中奠立的”。

在方仲师看来，资料的搜集、整理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他不仅这样教导我们，也是如此躬身力行的。他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便是一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基础建设工程的巨著。他还编辑了一部《明代地方志综目》（见《梁方仲遗稿》）。这部工具书同样是基础建设工程的著作。他撰写《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时之所以能参阅“逾千种”地方志，是因为他有这样基础性的研究基础。

方仲师视历史资料为历史学的生命。资料的翔实和丰富，成为方仲师著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并一直为史学界所赞誉。

不存在“唯一”的方法

方仲师在注重史料搜集、整理的同时，也注重、讲究治学方法。他强调作为历史学的从业人员，必须接受本专业的系统训练，包括中外历史知识、版本目录学、史料搜集与考据、分析研究方法、对前人论据的检核，以及研究操作规范等基本功夫的训练，甚至还需要掌握并能够运用其他相关的边缘学科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间，他就发表一篇题为《论社会科学的方法》的文章。他认为，方法论：（1）逻辑完整；（2）各门类各有其方法，有的方法是互通的；（3）方法中的实证检验法。社会科学是从实用价值着眼，否则没有意义。唯物、唯心、哲学、神学是社会价值问题，即所谓看法（Approach）问

题；只代表研究者对某些因素的特别注意，可分一元论与多元论两派。方法的选择，以目的决定：（1）要素齐全；（2）诸要素中质、量是否准确；（3）时空是否匹配。学科本身有适用于自身的方法，统计适用于量的分析，不适用于质的分析。方法是必须遵循的程序，亦即应用技术；有通则方法，亦有专科方法。这些见解于今仍然有参考价值。如果我们认真研读《梁方仲遗稿》一书，当可更深刻理解他关于方法论的见解。

作为历史学的从业人员，方仲师强调必须接受本专业的系统训练，所以，专业化的著作，要求对问题的看法深邃而系统。对一专业训练有素的学者来说，也许所论的似是小问题，却能小题大做、聚焦于小的同时，又要放眼于大格局。在选题立意、洞察幽微中，都应体现出一个人平时积累的学养。

方仲师经常教导我说，做学问要厚积薄发。没有足够的资料积累，先不要写。在读研究生期间，主要是学习、掌握历史研究的基本功，掌握方法论。那时，老师是不赞同学生急于发表文章的。方仲师嘱咐我：应珍视研习时段，向老师学习。当时不存在以量化品评高下。

从方仲师的著作中看，他对方法论注重而娴熟。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写过几篇学术评论文章，有的已被专攻学术史的学者收入关于学术批评的专书。^①记得2000年吴承明先生从澳门讲学回来路过广州。我前往谒见求教，他对我说：“我一直推崇佩服你老师梁先生。当我读到他对卜凯（John L. Buck）所著《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Chicago, 1937）一书的英文书评时，我觉得他比当时同辈的学者高明。惜我平生未曾有机会亲聆其教诲。”由于方仲师的学术评论态度诚恳，立论公允，对事不对人，并没有引发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间的失和。厦门大学陈诗启教授有一次对我说，1957年方仲师到厦门大学做学术访问的一次会上，曾严厉批评过他，言厉而心

^① 《中国田赋问题——评孙佐齐著〈中国田赋问题〉》，载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95—298页。

善，回想起来，殊感难得。

关于治学方法论问题，基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他没有给我太多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当时流行“阶级分析法”，甚至提到“唯一”的高度。有一次，他怒气冲冲地对我发感慨说：“哪来的唯一方法，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的方法。”

为人和为学的完美结合

方仲师驾鹤西去，已经48个年头了。我深深地感觉到，他离去时间愈远愈显得高大而伟岸。和他相处的日子，没有这般感觉。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经过这么些年，我才慢慢领略到方仲师在学术上的贡献及其价值。他在同国内外哲人宗师之交流中，体悟和理解中西文化之源流；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既勤奋耕耘于学术之一隅，又关注洞察学术的整体。他的学养、阅历、操守、才智和识悟，造就了他宽阔的学术视野，广博用宏。其学术成果坚实而丰硕，非同凡响。

方仲师的《一条鞭法》一书，乃天才之作，史识、史见震古烁今。此书由当年留学美国的王毓铨先生翻译，由费正清一手促成，并写序文，杨联陞手书“一条鞭法”四字中文作该书题签。此书被列为“哈佛大学中国制度史课程必读专著”。居蜜博士撰文道：此书“奠定梁方仲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地位”。同时“体现了当年国际汉学精英，同心协力，为学术铺盖一层基础平台”，也“体现了国际汉学的学术实力和世界平台”。并从中看到了“学术界的前景和希望”。^①

方仲师一生平实淡泊，与政治保持距离，忠于良知，不曲学以阿世，始终坚持独立自由的精神。“以读书、交友、著述、讲演为乐事”（暨南大学教授朱杰勤悼念方仲师文），把平生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待人慷慨大方，却以俭朴自处。从家居摆设，日常生

① 居蜜：《梁方仲治学管窥——以〈明代十段锦法〉和〈一条鞭法〉为例》，载陈春声、刘志伟主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活，到待人处事，都保持书生本色、平民情怀，坚守中国的传统美德。

方仲师学生的回忆录中每每谈到他认真讲课、认真辅导、认真批改作业的事例。我个人感受犹深。有一次他看了我的作业，严厉地批评我说：“主语经变换后，主语是不能省略的。”造句用词，都不放过。他蔼然可亲，谆谆教导，诲人不倦。说到高兴处，摘下眼镜，边擦边滔滔开讲。学生告退，他也每每送到门口台阶下，边送边谈，往往在门外又谈几分钟才回去。回忆起当年情景，真是如沐春风，如凌秋云。他那种雍穆仪态，祥和气度，总是令我肃然起敬，使我深刻认识到“身教”“行教”的力量及其价值。我们从方仲师身上可以看到为人和为学的完美结合，是我们当老师的、当学术研究从业人员的楷模。

遵方仲师哲嗣承邺兄之嘱，写下以上一些感言，是为序。

2018年11月13日

于广州幽篁室

序二：我心目中的梁方仲先生

赵德馨

五年前，承邳学兄告知，梁方仲先生的遗物中，有听课笔记、读书笔记、札记、未刊文稿、信件、案头日历记事等等，他准备整理出版。我认为，这批遗物内容丰富多彩，对理解梁先生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形成，他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不可或缺的；对了解 20 世纪 20—60 年代中国学术的走向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动态，有重要作用。例如，梁方仲先生 1930 年前后听陈岱孙两门课的笔记，1938 年听毛泽东讲矛盾论的笔记，1944 年听胡适讲中国思想史课的笔记，1953 年到 1955 年听陈寅恪两门课的笔记，等等，对研究这些人的思想与学术，是难得的文献。他的读书笔记，对所读之书提要钩玄。他的札记，有读书心得，有思想火花。至于《明代督抚表列》《明代地方志综目》、多项统计表等等，更是他多年艰辛劳动的心血结晶，可为后学者使用。它们很珍贵，若能出版，对学术发展是件大好事，一定会受到学界的欢迎。

两个月前，他告知遗稿已整理成册，嘱咐作序。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作为一个后学者受梁方仲先生教诲、影响与对他学术地位的认识过程，亦即我心目中梁方仲先生形象的生成过程。

1953 年 9 月初，我和周秀鸾由不同学校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学习。周秀鸾的同事介绍她说：“大经济史学家梁方仲的弟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梁方仲”这个名字，一个“大”字，印象至深。

1954 年 10 月间，师兄王方中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明代的资本主义

萌芽问题。尚钺老师要他读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可中国人民大学找不到这篇文章。他请周秀鸾向梁先生借用此文。不久，梁先生寄来了载有该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我想，尚钺老师这么重视这篇文章，它又这么难得，机会不可错失，便从周秀鸾处借来一读。由于底子薄，虽然读了两遍，还是似懂非懂。这是我第一次读梁先生的论文。读后的感觉是，经济史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一门很难学好的学问，梁先生的学问真大。

1957年冬，周秀鸾（此时已是我的内人）收到梁先生寄来的《明代粮长制度》一书。我认真地学习了。这是我第一次读梁先生的专著。读后，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梁先生的《一条鞭法》，从选题到分析方法，侧重于经济方面，《明代粮长制度》则侧重于社会方面。梁先生用经济学分析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得心应手；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历史上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运用自如，令人衷心佩服。读后，我也产生这样的疑问：像梁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快50岁了，为什么出版的第一本书写的是这么一个小题目？周秀鸾向我解释：第一，梁先生做学问极其严谨，不是成熟的东西不发表。第二，梁先生研究的问题有大有小，他对我们（指梁先生的研究生）讲过，小题可以大做，像从一滴水中看太阳那样。我从梁先生以及其他先生的事迹中受到启示，为自己立了一个规矩，50岁以前学习和积累知识与资料，50岁以后再写书。我主动给出版社交书稿，都是50岁以后的事。

1965年11月下旬，梁先生派人通知周秀鸾，他已到达武汉，住在武汉大学招待所。我们立即动身前去拜谒，那种高兴、急切的心情，至今未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令人遗憾的是，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后，梁先生谈兴很浓。他告诉我们，他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已经完成。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很高兴。他谈得多的是研究经济史学也要做实地考察，这个教诲使我受益终生。从那时起，不仅是研究现代经济史中的问题，即使是研究近代经济史和古代经济史上的课题，我也尽可能地做社

会调查。如我研究黄奕住，用了6个假期，到他出生和成长的南安，他回国定居的厦门，他投资的企业，他捐过款的学校、图书馆、医院、名胜古迹等做实地考察。又如研究楚国的货币，既到有关的博物馆去调查，还到一些银行作调查，还访问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者，收获丰厚。

1981年，复旦大学陈绍闻教授请我去审阅《中国古代经济文选》。我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看到梁先生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立即购买一册。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几千年间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户口、田地、田赋是事关农业发展和财政收支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梁先生此书是用统计学方法梳理历代户口、田地、田赋数量的变动情况，为解说中国经济通史做了一项基础性工作。对我这个以求通为一生努力目标的人来说，真是如获至宝。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如若对中国经济史没有通识，如若对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的有关制度变迁与运行机制没有做过专题研究，如若对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没有全盘的了解，如若没有统计学的功力，如若没有长期研究的坚韧意志，是不敢开展这项工作的。即或开展了，也很难取得这样的优秀成果。每次捧读此书，我心中就流溢出对梁先生学识与毅力的敬佩之情。1949年他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后，就为学生开设了中国经济史课程，从远古讲到清代，这标志着他在教学方面从明代经济史转向中国经济通史。这本书，在统计对象的时间上，自西汉至清末，计2100多年，不仅打破了朝代的界限，也跨越了古代、近代的界线，标志着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从断代走向贯通。它是梁先生研究中国经济通史的代表作。有人在介绍梁先生时说他是研究明代经济史的专家，这当然没错。但他又不仅是研究明代经济史的专家，他还是中国经济通史专家。

从1953年到1981年，我能从闻梁先生之名，读其文，学其著作，到一识荆州面，面接教言，深感幸运。

为了准备给研究生开一门有关经济史学科入门知识的课程，从1979年起到1984年，我集中精力研究经济史学科是一门什么性质的

学问和怎样研究这门学问，其内涵包括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经济史学科是一种怎样的结构，包含哪些分支学科，不同的分支学科应该研究哪些问题，怎样去研究，有哪些研究方法，经济史学科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出现了哪些学派，前人积累了哪些经验教训，等等。所有这些项目都与梁先生有关。从此时起，梁先生不仅是我继续学习的对象，也是我研究的对象。

在此，不可能详尽地介绍每个领域中梁先生的贡献以及对我的影响，仅举两项为例。

我对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考察，是从中外两个方面及其互动中进行的，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史学史上。这项研究使我得以从经济史学科成长的角度，关注各位经济史学家的贡献，也就是将梁先生与经济史学工作者群体中其他人进行比较，来看他的作用和特点。

在这项研究中，我发现中国经济史学经历过两个大的阶段，它们可以称之为萌芽阶段与成熟阶段，即孕育在中国传统史学（经、史、子、集四部之一的史学）之中的阶段与从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的阶段。两个阶段的区别在于：前者以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经济理论为指导，后者以现代的史学理论、经济理论为指导；前者采用中国传统范式与体裁，后者采用国际通用范式与体裁。因此，也可以将它们称之为传统型经济史学阶段和现代型经济史学阶段。从前一个阶段向后一个阶段的转变，始于19、20世纪之交，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主要标志是：出现了一批懂得现代型经济史学的专业人才，他们是以经济史学为志业的专门家；由他们组成的中国经济史专业研究机构；由他们发起的、以研究经济史为主题的专业学术团体；由他们主办或编辑的经济史学专业刊物与报刊专栏；由他们撰写的经济史论著成批问世；在大学里设置由他们主讲的经济史学课程和培养经济史学专业人才的机制；由他们提出的有关经济史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他们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梁先生是上述诸项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988年，在纪念梁方仲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的发言谈的就是这点体会，即就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建立

过程中的功绩而言，他是现代型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①我提出梁先生在经济史学学科发展史上这样的定位，得到与会的和梁先生同辈的汤象龙、李文治先生等老一代专家的认可，也得到后学者的赞同。现在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个人数不多的群体中，像梁先生这样的，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从事经济史学专业，一生未曾中断、心无旁骛、终生坚持经济史学的，不超过十个人。其中，像梁先生这样成就显著，著述不仅享誉国内，且被译成外文，受到国内和国外同行交口称赞的，人数就更少了。梁先生是现代型中国经济史学奠基人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经济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学派。吴承明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说有三大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来阐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力求作出计量分析。一派兼顾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可称社会经济史学派。三者也必然对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有不同观点和见解。”^②吴先生的观点获得广泛的赞同。不少同仁按此将某些经济史学专家划入不同的学派。具体到梁先生，也有人将他归于其中的某个学派。

对于中国经济史学中的学派，我在研究中得到以下三点认识。第一，划分学派首先要明确划分的标准。由于采取的标准不同，便会划出不同的学派。划分的标准可以是多样的，从而划出多样的学派。诸如：可以按参加的学术团体划分，将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联盟（以下简称社联）的，称之为“社联派”；参加中国经济学社的，称之为“经社派”。因为，不同的学术团体有不同的宗旨。参加哪个学术团体，是学者的自愿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社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① 周秀鸾：《梁方仲——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载汤明铤、黄启臣主编：《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又载《周秀鸾经济史学论文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此文由周秀鸾整理，她提议署二人姓名，我以文本单薄短小，未予同意。

② 吴承明：《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48页。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学派，如人口学派、军事学派、地理学派，等等。